

# 郁离子

〔明〕刘基著

国学经典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国学经典

〔明〕刘基著

# 郁离子

吕立汉 杨俊才 吴军兰 注译

中州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郁离子/(明)刘基著;吕立汉,杨俊才,吴军兰注译. -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1  
(国学经典)  
ISBN 978 - 7 - 5348 - 2847 - 8

I. 郁… II. ①刘…②吕…③杨…④吴… III. ①政治思想 - 中国 - 明代 - 史料②笔记 - 中国 - 明代 - 选集③郁离子 - 注释④郁离子 - 译文 IV. D092. 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1325 号

---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16

字数:183 千字 印数:1—3 000 册

版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2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郁离子



# 前言

—

刘基（1311—1375），字伯温，青田县九都南田武阳村（今属文成县）人，元末明初杰出的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元至顺四年（1333）举进士，至元二年（1336）步入仕途，先后任江西行省高安县丞、江西行省职官掾史、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等职。至正十二年（1352），省檄刘基为浙东元帅府都事，赴庆元（今浙江宁波）、台州、温州沿海一带参与戎事，次年十月，因建言捕斩方国珍，为上官所驳，后革职“待罪”绍兴。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复为江浙行省都事，赴处州（今浙江丽水）与石抹宜孙共谋“括寇”，“宜孙用基等谋，或捣以兵，或诱以计，未几，（山寇）歼殄无遗类”<sup>①</sup>。至正十八年（1358），升任江浙行省郎中。是年年底，经略使李国凤巡行处州奏守臣功绩，而执政者抑刘基军功，仅由儒学副提举格受处州路总管府判，刘基遂愤而弃官归里，著《郁离子》。

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应朱元璋之聘，与宋濂、章溢、叶琛同赴应天（今南京市），刘基面陈“时务十八策”，深得朱元璋赏识，

---

① 《元史》卷一八八，《石抹宜孙传》。

遂留帷幄，参与军机，为朱氏殄灭群雄，最终推翻元王朝统治登上皇位，立下了不朽功勋。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即吴王位后，刘基渐次弃武归文，历任太史令、御史中丞等职，为朱明王朝在军事、法律、科举等制度的建设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洪武三年（1370），晋封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护军、诚意伯。洪武四年（1371），因官场险恶，刘基激流勇退，隐居故里，“唯饮酒奕棋，口不言功”。洪武六年（1373），因建议设谈阳巡检司一事，遭胡惟庸等构陷，朱元璋偏听偏信，夺诚意伯刘基食禄。同年六月，刘基入朝引咎自责，留京而不敢归。洪武八年（1375），因病重，于三月“乞骸骨”还乡，四月十六日卒，享年65岁。卒后，于明正德九年（1514）朝廷加赠“太师”美号，谥“文成”。明武宗称他为“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有“帝师”、“王佐”之誉。

刘基一生著作颇丰，计有《郁离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写情集》四卷、《犁眉公集》五卷、《春秋明经》二卷，诸集皆于明初先后梓行于世。嗣后，诸单刻本统为一集，名《诚意伯刘先生文集》二十卷行世，明正德后易名《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或《诚意伯文集》流传至今。

## 二

作为一部寓言散文集，《郁离子》是中国寓言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其牢笼万汇、辩博奇诡的文学审美价值，更重要的还在于其中闪烁着刘基治国安邦的思想光辉，以及对特定时代的社会认识价值。

《郁离子》绝大部分篇什当作于元季至正十八年（1358）年底到至正二十年（1360）年初，但也并不排除少数作品成于明初。<sup>①</sup> 刘基

<sup>①</sup> 详见拙著《刘基考论》，第206—208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

创作《郁离子》之时，已对元王朝完全失去了信心。这种心态在《郁离子》中就有反映，《千里马第一·贿赂失人心》云：

北郭氏之老卒，僮仆争政。室坏不修，且压。乃召工谋之。请粟，曰：“未闲，女姑自食。”役人告饥，莅事者弗白而求贿，弗与，卒不白。于是众工皆惫憊，执斧凿而坐。会天大雨霖，步廊之柱〔柱〕折，两庑既圮，次及于其堂，乃用其人之言，出粟具饔饩以集工，曰：“惟所欲而与，弗靳。”工人至，视其室不可支，则皆辞。其一曰：“向也吾饥，请粟而弗得，今吾饱矣！”其一曰：“子之饔渴矣，弗可食矣！”其三曰：“子之室腐矣，吾无所用其力矣！”则相率而逝，室遂不葺以圮。<sup>①</sup>

从加着重号的文字可见作者对元王朝已失望至极，说明刘基此时已不愿做元王朝的殉葬品。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便有理由说《郁离子》与前此而成的《覆瓿集》<sup>②</sup> 在创作动机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即它并非是为元朝的覆亡唱挽歌，而是针对元季社会弊端为未来新王朝设计治国方略。《郁离子》结尾云：

方今成弧绝弦，枉矢交流，自始掩抢，降魄流精，为豕为豺，为蛟为蛇。犬失其主，化为封狼，奋爪张牙，饮血茹肉。淫淫濡濡，沉膏腻，穷渊积，骸连太陵，无人以救之，天道几乎熄矣。而欲以富贵为乐，嬉游为适，不亦悲乎？仆愿与公子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究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肆礼乐，以待王者之兴。（《九难第十八·难九》）

- 
- ① 文中所引刘基原文，凡属《郁离子》的，以本次校勘为准；其它诗文则引自《四库全书》文渊阁本《诚意伯文集》二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出版。
- ② 《覆瓿集》二十四卷汇总刘基元季诗文作品，创作时间前后延续数十年，而《郁离子》基本上可视为一时一地之作，故谓《覆瓿集》绝大多数诗文的创作时间应早于《郁离子》。

这段话我们很可看作是刘基对《郁离子》一书写作意图的自白。他明确地告诉读者：本书的创作目的是“以待王者之兴”。

明隆庆时人李濂说：“《郁离子》何为而作也？青田刘文成公隐居而言，发愤以明志，自伤其莫用于世，而期兴文明之治于异时也。”<sup>①</sup> 刘基的弟子徐一夔也认为：《郁离子》创作之动因在于作者本人虽有“匡时之长策”，“欲以功业自见”，而“当国者，乐因循而苟且”，以致“抑而不行”，故发愤而撰《郁离子》一书。他又说《郁离子》“其言详于正己、慎微、修纪、远利……明乎吉凶祸福之几，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迹。大概矫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初，公（刘基）著书，本有望于天下后世，讵意身亲用之？”<sup>②</sup>

综合他们两人的说法，我们认为刘基《郁离子》的创作动因在于有激于“元室之弊”和他本人的遭际；创作目的是“有望于天下后世”，兴文明之治。

《郁离子》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它针对元王朝的种种弊端为未来新王朝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略。遵循对症下药这一基本原则，刘基为未来新王朝开具的总药方是“以大德勘大乱”（《麋虎第十六·井田可复》）。

要以德治国，首先当国者自身应有德量。刘基说，人之度量相去甚远，大者有如江海，微者则如礮泉，而君人者必须具有容纳百川的江海德量。“君人者，惟德与量俱，而后天下莫不归焉。德以收之，量以容之。德不广，不能使人来；量不弘，不能使人安。故量小而思纳大者，祸也。汋谷之蝇，不可以陵洪涛；蒿樊之駕，不可以御飘风。大不如海，而欲以纳江河，难哉！”（《蠚蠚第七·德量》）一国之君惟有德正量弘，方能明辨是非，任贤斥佞；广开言路，博采众

① （明）李濂：《书〈郁离子〉后》，见（明）嘉靖三十五年何鏗刻本《刘宋二子》。

② （明）徐一夔：《〈郁离子〉序》。

议；修明法度，治国安邦。

作者认为当国者还得有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的忧患意识，这正是元末执政者所缺少的。至正初年，灾异频仍，黄泛区“民饥盗起”，朝廷未采取行之有效的补救措施，以致事态蔓延、恶化，局面难以收拾。刘基说：

一指之寒弗燠，则及于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燠，则周于其四体。气脉之相贯也，忽于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于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也，遂至于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亡一邑不足以为损，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后倾天下之力以救之，无及于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是故，天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脉之所至，举不可遗也。（《千里马第一·乱几》）

刘基以“身”喻国，生动地说明了必须防微杜渐这一深刻道理，实际上是找出了元末时势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以作后世当国者的前车之鉴。

基于“以大德勘大乱”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刘基制定了以德养民，以道任贤的治国方略。

国以民为本。所以，历来明君治国总以保民、安民、养民为先。刘基以“沙”喻民，认为善当国者是“以漆抟沙，无时而解”，次之是“以胶抟沙，虽有时而融，不释然离也”；又次之是“以水抟沙”，“其合也，若不可开，犹水之冰，然一旦消释，则涣然离矣”；再下者为“以手抟沙，拳则合，放则散”（《千里马第一·抟沙》），此乃以力聚民，终不得法，故民叛之亦易。

那么，一国之君又怎样才能提高天下民众的凝聚力呢？那就是以德养民，而非以术诈民。“先王之使民也，义而公，时而度，同其欲，不隐其情，故民之从之也，如手足之从心，而奚恃于术乎！”（《天地之盗第八·养民之道》）人病渴不可刺漆汁以饮之，池有獭不可毒其

水而保鱼。同理，国有乱而不可掠其民而治之。为此，刘基主张“养民瘳国脉”（卷三《田家》），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当国者要体察民情，顺应民心。“夫民情久佚则思乱，乱极而后愿定。欲谋治者，必因民之愿定，而为之制。然后强无梗，猾无间，故令不疚而行。”（《麋虎第十六·井田可复》）要拨乱反正，实现“王政”，吏治、人才是关键。“万乘之国，兵不可以无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吏；百姓殷众，官不可以无长。”<sup>①</sup> 治理国家单靠一个皇帝不行，而需要成千上万的各级官吏共同努力。元朝大厦之倒塌，很大程度是因用人不当、吏治腐败所致。所以，未来之当国者必须整顿吏治，尤其要重视人才的选拔、培养、任用、考核、升迁等各个环节，尽最大之可能，做到人尽其材，为国所用。

那么，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刘基认为要以德招贤、以义待贤、以道养贤、以信用贤。

首先，当国者和执事者要具有识别人才的慧眼。行医者须懂药理，要善于识别名贵之药、普通之药和虎狼之药。切忌将外观极美，实则“但有杀人之能，而无愈疾之功”（《玄豹第三·采药》）的虎狼之药误作名贵之药使用。用人亦如行医，人才也有大小优劣之分。大才大用，小才小用，无才不用，尤其要注意识别那些“状如黄精”、“其状如葵”，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假人才，“无求美弗得，而为形似者所误”。（同上）因此，培养人才得先找准“苗子”，审其德、量其才、考其绩，然后定夺升迁。若误将庸才当俊才培养、使用，则无异于“楚太子养枭”（《千里马第一·养枭》）。

其次，选拔人才要放开眼量、拓宽视野，既不要像“梁王嗜果”“独求之吴”（《拘椽第六·拘椽》），也不要像“燕文公求马”，舍近而求远，更不能以种族、地域分，“非冀产”（《千里马第一·千里

---

<sup>①</sup> 《管子》卷一。

马》)则不用。概言之，要惟才是举，惟才是用。在人才的使用上，要“量能以任之，揣力而劳之。用其长而避其缺，振其怠而提其蹶”(《麋虎第十六·立教》)。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考核官吏要看主流，不可攻其一点，否定其余。譬如钟山之猫，既抓鼠也吃鸡，“月余，鼠尽而其鸡亦尽”。赵人说：“吾之患在鼠，不在乎无鸡。……无鸡者，弗食鸡则已耳，去饥寒犹远，若之何而去夫猫也？”(《拘豫第六·捕鼠》)官吏升迁要既看德才，也看政绩，不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杜绝“悉取世胄昵近之都那竖”(《千里马第一·规执政》)的用人弊端。用人须用而不疑，疑而不用。“善疑人者，人亦疑之；善防人者，人亦防之。……夫天下之人，焉得尽疑而尽防之哉？”(《蠭蟻第七·任己者术穷》)如此等等，即是刘基的人才观。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刘基的治国方略实本于儒家的“王政”思想。其“以德勘乱”的总体构想与孟子的王道、仁政是一脉相承的。不同之处在于：刘基更为重视人才在治理国家当中所起的作用。

《郁离子》中严格意义上的寓言作品约占六成，他作多属先秦式的寓言、重言和卮言。第十八章《九难》则纯粹是赋体。所谓卮言，是抽象的论理；重言是不求信实地征引某些历史故事或古人之言；寓言则是论述中采用虚构假托的故事或自然物的拟人化来寄寓某种事理。一般地说，以“郁离子曰”开篇直抒己见之作大都属卮言，而寓言和重言往往是融为一体，难以分割，一般情况是寓言含于重言之中。

在构思、立意、取材、语言特色和行文风格上，《郁离子》都明显受到古代寓言、重言、卮言创作的影响，但毕竟不是同一水平的回归复现，它已融进了作者自身的思想感情，打上了时代烙印，为寓言艺术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如果说，借鉴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那么刘基在继承的同时，却富有创新意识。这种创新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立意上的推陈出新。《郁离子》在取材上有所依傍，但一经作者加工便显现出崭新的创意。如《瞽聩第五·术使》是源于《庄子·齐物论》和《列子·黄帝篇》的“朝三暮四”故事，《庄子》是以其论证世上诸事皆“无是非”的观点，《列子》则以其说明“名实未亏”的道理。原作中的众狙愚昧无知，让人觉得黎民百姓只需统治者稍使诈术，便可驯服之而坐享其成。这一寓言经刘基改写，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众狙”，已不再是任人摆布的驯服工具。他们在狙公的残酷压榨下猛然醒悟而奋起反抗，“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瞽聩第五·术使》）其主旨一变而为警告当权者对黎民百姓的盘剥不要过于苛刻，否则，将物极必反。这样的立意，无疑要比原作高出许多。

第二是题材上的更新、拓展。题材上的更新、拓展有多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构思立意有所借鉴，但创作材料全是新的，加之立意的深化、提高，故仍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二是所用史料典籍所载多为一鳞半爪，作者仅将其做为一条引线，据以作合理的想象和生发。三是另辟蹊径，瞄准现实，为后世寓言作家踏出了一条更为宽广的创作路子。在此尤值一提的是那些取材于现实生活，经作者巧裁妙剪、提炼加工的名篇佳作。如《拘椽第六·冯妇之死》，这则寓言虽源于“冯妇搏虎”这一典故，但其主要情节和内容都是取材于现实生活。东瓯（温州）方言至今“火”“虎”不分，晋国冯妇这个搏虎能手居然被请到东瓯去灭火，以致被“火灼而死”！且至死尚不悟其因，读之让人啼笑皆非，细思则有深意寓焉。作者以此告诫当国、执政者用人要用其所长，否则便是“扼杀人才”！

中国古代较少拟人化的动物寓言，这一现象直到柳宗元的手中才有了很大的改观。刘基循此而进，创作了大量的动物寓言，如《蟾蜍与蚂蚁》、《九头鸟》等，皆可视其为动物寓言的精品，这是刘基对寓言艺术的一大贡献。

第三是向寓言体小说迈出了重要一步。《郁离子》大体上是一部寓言体散文集，但就其某些篇章而言，则以小说称之更为合适。如《虞孚第十·蹶叔三悔》，叙蹶叔不听友人劝告，务农、经商皆一再违反自然规律而一无所获。虽多次对天发誓痛改前非，但老毛病还是经常复发。某次泛海行商，又不听友人劝告而误入大壑，历经九年才死里逃生。“比还，而发尽白，形如枯蜡，人无识之者。乃再拜稽首，以谢其友，仰天而矢之曰：‘予所弗悔者，有如日！’其友笑曰：‘悔则悔矣，夫何及乎！’”行文中活脱脱地勾勒出一个“好自信，而喜违人言”的人物形象，无疑是一篇具有劝惩意义的寓言体讽刺小说。他如《瞽聩第五·即且》、《麋虎第十六·唐蒙与薛荔》等皆可归入此类。

后世小说有寓言体一支，其受《郁离子》的启发亦并非不可能。寓言先以政论散文的附庸流行于先秦，后来摇身一变而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再变则成为文言短篇小说之一脉，《郁离子》在其嬗变的过程中，无疑起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

《郁离子》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徐一夔谓其“牢笼万汇，洞释群疑，辨博奇诡，巧于比喻，而不失乎正”<sup>①</sup>，并非过誉。但其主要成就则体现在讽刺艺术的成功运用之中。

首先，《郁离子》的讽刺矛头总是对准元季的社会现实，具有很强的真实性和针对性。如《千里马第一·千里马》、《千里马第一·八骏》就完全是以讽刺元王朝的民族歧视政策的。马虽为“千里马”，只因其“非冀产也”而不予重用；马的优劣以产区分为四类（犹元之将人分为四等），其结果是“天闲之马”“素习吉行”，不事戎事；“内厩之马”养尊处优，“望旆而走”；“外厩之马”与“江南散马”因“食粟”不公而不愿尽力，故一旦“盗起”，则无马可用，

<sup>①</sup> (明)徐一夔：《〈郁离子〉序》。

这是对元廷在人才使用上搞民族歧视的绝妙讽刺！

其次，刘基能做到“公心讽世”，所以对元室之弊的剖析就较为客观。作者时常以“局外人”的冷眼旁观去审视元廷近乎荒唐愚蠢的所作所为。如《省敌第九·九头鸟》，作者是以“九头鸟争食”影射元廷“南坡之变”、“两都争战”之兄弟相残，辛辣地嘲讽了元廷因争夺皇位而内讧时起、政变相继的愚蠢行径。文中“海鬼”可谓作者之化身，以旁观者之口吻一针见血地点明了“九头争食”之愚昧可笑，这种“露底法”的讽刺是很可以见出刘基讽世是抱持怎样的一种态度的。

刘基善于从现实生活中挖掘、提炼托讽的素材，将某一严肃的社会问题或蕴涵丰富的人生哲理通过司空见惯的生活细节予以揭示。如《玄豹第三·西郭子侨》：

西郭子侨与公孙诡随、涉虚，俱为微行，昏夜逾其邻人之垣。邻人恶之，坎其往来之涂而置溷焉。一夕又往，子侨先堕于溷，弗言，而招诡随，诡随从之堕。欲呼，子侨掩其口曰：“勿言。”涉虚至，亦堕。子侨乃言曰：“我欲其无相咥也。”

西郭子侨的所作所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政界某些贪官污吏因自身之龌龊而怕人揭短，就不择手段拉人“下水”，与之同流合污，因而作者从人格上对西郭子侨予以根本否定，并说：“西郭子侨非人也，已则不慎，自取污辱，而包藏祸心，以陷其友，其不仁甚矣！”如此尖锐辛辣、寓意深刻的作品，就是通过现实生活当中的常有之事加以表现的，只不过作者于此对托讽素材已作高度典型化的艺术处理罢了。

刘基是一位设喻高手，对于元季这架锈迹斑斑、难以运转的国家机器，他先以“病”喻，谓当国者是“庸医”；既不知脉，又不知症，更不善于为方而对症下药；又以“屋”喻，谓执政者当局部“屋漏”之时不以为忧，及至大厦行将倾覆则百般无奈，坐以待毙；又以“船”喻，以航沧溟而无舵师去影射元顺帝之昏聩无能，如此

等等，不一而足。作者正是通过种种类比，多层次、多角度地影射元廷之全面崩溃，收到了很好的讽刺效果。

从艺术风格来看，《郁离子》兼有辛辣尖锐和诙谐幽默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而从总体上看则以前一种风格为主，这与其散文“气昌而奇”的总体风格是相一致的。

### 三

本书体例为：原文加校注。

(一) 原文。原书共18章，188则短文，有章名，各篇短文的题目则为编者所加。原文以简体字排版。原书中的异体字一般径直改为通行字，如恆、炤、涖、壘等字皆直接改成恆、照、涖、望，不加说明。《九难第十八》为赋体。赋家撰文喜用生僻词汇，故其中的异体字仍予以保留，以保持原有风格。

(二) 校勘。《郁离子》最早是以单行本梓行于世的。据吴从善《郁离子序》，知此书曾被章溢“刊置乡塾”。章溢卒于洪武二年(1369)，可见《郁离子》至迟在洪武二年即已刊行，当为最早之刻本，惜今不存。从文献记载看，《郁离子》仅单行本就有十卷本、五卷本、四卷本、二卷本和简缩本。今存二卷本和简缩本。今存所有刘基文集的总集都收录《郁离子》，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明成化六年戴用、张僖刻本《诚意伯刘先生文集》二十卷为今存最早的刘基诗文总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明刻本《诚意伯刘先生文集》二十卷，其梓行时间仅晚于戴用、张僖刻本，比现存《郁离子》单行本的刊刻时间则早出许多，本次校勘即以此为底本。参校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出版的《四库全书》文渊阁本《诚意伯文集》二十卷(简称“文渊阁本”)，浙江省文成县南田镇伯温图书馆收藏、乾隆十一年梓行的括苍南田果育堂刊本《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二十卷(简称“果育堂刊本”)，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出版的《四部丛刊初

编·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二十卷》(简称“四部丛刊本”)。

校勘遵循以下原则：(1) 底本明显的错别字出校；(2) 在文意理解上明显有误的出校。当底本与参校本文字存在差异，但不影响文意理解则以底本为准。

(三) 注释。注释力求简明、扼要；对较难理解的句子，除对重要的字、词加以注释之外，还就整句话作了翻译或解释。

(四) 本书校勘、注释，采用分工合作的方式完成，最后由吕立汉统稿。

(五) 在校注过程中，我们参考了由张学忠选注的《郁离子》(花城出版社 1983 年出版)，熊宪光编译的《郁离子寓言选》(重庆出版社 1982 年出版)，鲍延毅编译的《〈郁离子〉寓言故事选译》(北京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等《郁离子》选本。谨此一并致谢！由于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吕立汉

2006 年 5 月 8 日